



# 试论基督教修道制度的起因

田明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市 300071)

**摘要:**公元3世纪,基督教修道制度起源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对其起源的探究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课题。本文主要从其思想来源、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对修道制度兴起的原因进行了研究。作为修道制度的滥觞之地,埃及本土所起的作用也是文章重点之所在。

**关键词:**修道制度;埃及;起源;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B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7)05-0173-04

所谓基督教修道制度,指的是一些虔诚信徒,摒弃尘世生活,禁欲苦修,以求达到和上帝灵魂相融的境界。公元3世纪,修道制度起源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长期以来也被视为埃及教会基督教世界的伟大贡献。修道制度最原始的模式是单独隐修,其创始人埃及的安东尼(251—356年)。大约从285年开始,安东尼放弃了原来优越舒适的生活,独自前往荒寂的沙漠中隐修,后来又移居到条件更恶劣的废弃墓穴中苦修,开启了独修生活的先河。和他大约同时代的亚历山大大主教阿塔纳休斯在他死后不久就写了一部《安东尼传》(或译为《安东尼生平》),使之死后享有了更高的盛名,获得了“修道制度之父”的美誉,并成为圣人而名垂千古<sup>①</sup>。而后又经帕克米乌斯等人的发展,出现了集体修道院,后来的基督教修道制度都直接或间接地起源于埃及。

对基督教修道制度起源的研究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课题,它包含了历史学、宗教学、哲学和社会学等多方面的内容。从修道制度诞生之日起,就有人关注于此,其覆盖面之广、研究方法之多,使得许多学者涉猎其中,乐此不疲。本文主要拟从思想来源、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对修道制度兴起的原因进行探究。当然,文中也用较多的笔墨描述了作为修道制度的滥觞之地的埃及,其本土文化对基督教修道制度的影响。

## 一、修道主义的思想根源

关于修道制度兴起的思想渊源,学术界有较大的分歧。有人认为基督教修道主义直接来源于犹太教的禁欲传统<sup>[1]270-287</sup>,隐修者只是恢复了犹太苦行教派的生活方式。还有人主张修道主义可能受到东方思想的一定影响。虽然还没有发现具有出世特征的佛教与埃及的古代宗教有直接接触的文字资料和遗迹,但是这种隐居方式却表现出了东方宗教的性质<sup>[2]1</sup>。的确,早在希腊化时代,西方和印度就有了一定的接触,佛教思想传入希腊化的埃及也不是没有可能。近来一种解释是试图证明沙漠教父是犹太—巴勒斯坦旅行传教士和先知们的继续。这些人的后裔在寻找更激进的改革,建立了与激进生活完全一致的社会<sup>[3]13</sup>。其证据是圣安东尼虔诚的声望吸引了许多信徒,以致不得不查明是埃及人还是耶路撒冷人,只有后者才有资格和他讨论精神问题。

有些学者更愿意从基督教自身探讨修道制度的起源,如费尔巴哈就主张“想仅仅由东方导出僧侣生活来,那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了。我们宁可说僧侣制必须直接由基督教本身之中导出出来,因为人在上帝里面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一个个体都是独自与上帝同在的。只有上帝,才是基督徒所需要的,为此,基督徒并不需要别人、人类、世界,他缺乏

<sup>①</sup> 原著参看:Athanasius, trans. by Gregg, The life of Antony, New York 1980. 与后来的教会史中修士写主教生平不同的是,早期埃及教会中是主教和大主教在圣安东尼死后不久就开始记载修士生平。

收稿日期:2007-04-27

作者简介:田明(1972-),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内蒙古民族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世界古代史。

对别人的内在需要。所以,基督教之本质重要的目的,便在于脱离世界,脱离物质,脱离人类生活”<sup>[4]217-218</sup>。基督教徒认为“彻底否认尘世的追求”才能达到和上帝灵魂交融的目的,这或许也成为修道主义的本质特征<sup>[5]58-66</sup>。

此外,修道主义思潮难免也会受到当时流传甚广的希腊哲学的影响。古典时代之后,希腊化世界的学术中心由雅典转向了埃及的亚历山大,希腊哲学在这里有了新的发展。而且,基督教神学就是犹太神学和希腊哲学的结合体,二者的交汇之地也正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埃及是当时两希文化结合的媒介,也是基督教神学诞生的助产士。在这一文化发展过程中,亚历山大城所起的作用尤为明显。深入的文化互动使亚历山大先是成了希腊化犹太教的中心,后来又成了希腊化基督教的神学中心,代表了当时基督教世界最高的学术成就。可以这样说,三大宗教信仰的圣地是耶路撒冷,神学的圣地则是亚历山大<sup>[6]19</sup>。因此,修道主义思想中难免会有希腊哲学的影子:“这些僧侣,在藐视财富、痛苦和死亡方面真不在斯多葛学派之下;毕达哥拉斯的沉默和顺从在他们的奴隶般的纪律中又复活起来了;他们也和犬儒学派一样坚定地厌恶文明社会的一切形式和礼仪。”<sup>[7]115</sup>

以上几种解释尽管有一定合理成分,但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忽略了埃及本土思想的作用。尽管人们很难把这种个人虔行与法老文明及其泛神论信仰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埃及法老时代的一些信件和铭文中有许多和修道类似的话,如“通向神之路”、“自己祈祷”、“召唤我的名字”。在埃及的“帝王谷”中就有这样一类词汇,如“精神上的荒寂”、“仁慈的照顾我”和“不要因为我的罪来惩罚我”,可见在基督教之前很多世纪就有人以这种方式祈祷<sup>[8]37</sup>。考古发现公元1世纪的斯林格纸草显示了在法老时代和早期基督教之间,埃及就有了一个神性的概念;当人们举起手,神即已知晓……他知道哪些是心存邪恶的人……他知道哪些人心目中有上帝……是他给与了法律与审判……他创造了光明与黑暗……他创造了日、月、年和大地……幸运与不幸都是神所赐<sup>[9]184</sup>。希腊化时代以来,托勒密王朝信奉的是兼有法老埃及和希腊文化双重特征的塞拉匹斯神,并一直延续到罗马帝国时期,而塞拉匹斯本身就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色彩。所以有人主张修道主义是埃及古代宗教(塞拉匹斯的隐遁)某种程度的复兴<sup>[10]1661</sup>,尽管这带有一定的冒险性。但埃及早期基督教神学家奥利金就曾自我阉割,禁欲苦修,足以说明这种思想在埃及之根深蒂固。正如吉

本所言,“迷信的果实累累的母体埃及为僧侣的寺院生活提供了第一个范例”<sup>[7]115</sup>。

## 二、修道制度兴起的政治与社会因素

3-4世纪罗马帝国的变化是修道制度产生的社会原因。当时,罗马帝国社会危机严重,人们朝不保夕,精神颓废,避世思想流行,因此安东尼的事迹传出后立即吸引了大批追随者,效仿他的行动,聆听他的教诲<sup>[11]419</sup>。同时,基督教教会组织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最初由社会下层民众自发组成的早期基督教社团,带有一定的宗教慈善组织性质,它的成员互助互救,扶危济困。公元2世纪以后,基督教会逐渐被富有者把持,他们以手中的财富在基督教社团中占据特殊的地位,垄断了本应由选举产生的主教一职,使这个民众的宗教社团开始向有等级的、官僚的组织机构发展。教会组织性质的变化在基督徒中引起了不满和各种形式的反抗,一种普遍的发自内心的焦虑增添了人们对社会的厌倦<sup>[12]28</sup>,隐修士的出现就是一种消极的反抗。

对于修道主义的兴起,另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对罗马帝国基督教政策的回应<sup>[13]102</sup>。基督教兴起之初,一直不容于罗马帝国,并多次受到迫害。修道制度的发源地埃及是受迫害程度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早在3世纪中期,罗马皇帝戴克里斯就开始迫害基督徒,其中尤以埃及亚历山大为甚,教会史家尤西比乌斯用比较大的篇幅记载了这一事件。在那里,血腥的镇压持续了一整年,许多基督徒遭受肉体迫害,如棒打、刺伤脸部和眼睛,甚至被投入监狱直至杀害。然而比起后来的大迫害,这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284年,戴克里先即位为罗马帝国的皇帝,除了进行一系列改革外,统一动机下最有影响的活动当属他对基督教的迫害。用武力粘合起来的帝国包含了许多在背景、语言、文化不同的种族和民族,这种差异普遍反映在国教信仰问题上。拒绝异教形式的基督徒,是政治上不相容和未同化的元素,因此帝国自然要逐步同化或消灭他们,而且似乎可以看出大迫害并非出自戴氏个人动机。经过一系列流血冲突,教堂被摧毁了,宗教典籍也被焚毁了,涌现出大量的殉教者。殉教者的精神和事迹鼓舞着基督徒去从事另类的宗教活动,从宗教角度讲,修道运动的兴起也是基督教殉教者价值的体现。当然,这次迫害使年轻的埃及教会遭受重大创伤,并永远留在教徒们的记忆中,科普特教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殉教者”教会。科普特教会开始于“殉教时代”,以戴克里先即位为起点,迄今为止,科普特历

法并不是以耶稣诞生而是以 284 年开始纪元的(戴克里先迫害实际上发生在 299—304 年)。

但埃及教会的苦难还不止于此。当西方的君士坦丁已开始采用保护基督教的宽容政策时,埃及却在东方的马克西米努斯统治时(311—312 年)对基督教的迫害达到了顶点。同时代的教会史家尤西比乌斯亲眼见证了这场变故,亚历山大主教彼得殉难,这件事在罗马教会中也有记载。最大的悲剧发生在埃及的底比斯:一天接一天地有 50—100 名“顽固”的农民——科普特基督徒殉难。驻扎在瑞士的罗马军队中的由埃及人组成的底比斯军团,在首领圣·梅里斯的带领下,也显示了同样“顽固”的抵抗,遭到“逢十出一”的杀害,直至最后一人<sup>[3]11</sup>。诸多的迫害导致个人沿着荒凉的沙漠边缘去寻找庇护所。

但是,这些因素中没有一个因素可以完全说明修道运动兴起和快速扩散的原因。须知,迫害并不局限于埃及,为什么仅在这里兴起了修道运动?更令人费解的是,接踵而来的帝国基督教政策转变之后<sup>①</sup>,为什么修道运动依然活跃,甚至还出现了集体修道院,并逐步传播到帝国各地?这要从埃及自身的文化特点及其与罗马帝国微妙的关系中来寻找答案。

埃及从来就不是一个典型的罗马行省,并且始终和帝国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因而我们经常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当帝国反对基督教时,埃及有许多虔诚的教徒;而当帝国推行有利于基督教的政策时,埃及却又表现出了另类的特点。因此随着“君士坦丁敕令”的颁布,在基督教取得合法信仰的地位以后,通过修道活动以摆脱帝国控制,保持宗教信仰自由,这是埃及人的第一条出路<sup>[14]226—234</sup>。尤其是在公元 3、4 世纪期间,尽管物质实力很弱,但埃及的修道士们却是一种潜在的势力集团,并在基督教世界,特别是东正教的教义分歧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些由隐修士组成的有组织社团,汇集在修道院中,其力量之大以致敢于公然藐视皇帝的权威,进而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而土著埃及人信仰的改变正是在修道士运动中显现出来,早期修道者的代表人物安东尼和帕克米乌斯无疑都是地道的埃及人,因为他们不讲希腊语,也没获得希腊模式的教育。“修道制度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土著埃及人的产品,埃及教会也因此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sup>[15]86</sup>,可见,修道运动的兴起和埃及民族主义觉醒有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

### 三、修道制度兴起的经济背景

任何思想文化运动的背后都或多或少与当时的经济状况有一定的联系,修道运动兴起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当时的经济问题。在托勒密时代,如果一个农民感到处境艰难,他可以进入众多神庙寻求庇护,直到获得救济才离开。罗马统治下,这种权利被严格限制,另外的方法就是逃避到沼泽地或沙漠中;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前往大城市,凭着创造力和运气努力使自己的厄运朝着有利方向发展。然而 3 世纪以来罗马帝国陷入全面危机,农业凋敝,商业萧条,城市衰落,社会动荡,道德败坏,衰败的社会经济和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一种机会连理论上的可能都不复存在了。这一过程中,埃及也未能幸免,3—4 世纪发生了经济危机,人们被迫逃离家园,另寻生路。

这种情形下,埃及税收却并没有减少,某种程度上还有些变本加厉地增加。帝国通过向“罗马粮仓”——埃及征收前所未有的高额赋税来满足统治者贪得无厌的需求,来缓和 3 世纪危机所带来的恶果。罗马帝国后期,戴克里先为了更好地控制埃及,把它一分为三,每一个行省都由一名军事长官(杜克斯)统治,取消了所有地方自治的虚衔,并驻扎了以前 3~4 倍的军队,大量驻军和政府人员的增多无疑加重了当地居民的负担。戴克里先改革以后,基于财产和人头的赋税已经重到无法忍受的地步,还要收取一些军事费用。这一时期的书信往来也反映出当地人需要承担部分士兵的开支<sup>[16]425</sup>。

除此之外,因为包税制埃及人民还深受当地贵族的盘剥。包税人收税的方式非常粗鲁,而且严厉惩罚那些逃税者,这些富裕地主们享受着财富增加的乐趣。当时的埃及呈现出一种“富者逾富,贫者逾贫,中产者走投无路”的经济状况<sup>[17]129</sup>。特别是 4 世纪早期通过购买方式把国有土地变成私产的结果,使得大地产者的势力足够强大以致可以给予农民佃户一定程度的保护,用来对付那些政府的代理人,如贪婪的税收官、爱生事的官员和粗暴的士兵。为了寻求一种庇护,不少小农户又主动“献地”给大地产者。由于沉重的赋税和土地兼并,不堪重负的贫苦农民在不断地起义反抗遭到镇压后,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那就是逃往沼泽或沙漠地带。

事实上,源于希腊语的“隐士”一词,通常有双重含义:一是指逃避赋税的人,另一是指隐退以强

① 313 年,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正式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罗马帝国的迫害政策宣告结束,基督教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化宗教信仰的人<sup>[18]2</sup>。从国家的观点出发,这些沙漠教父不过是兵役和税收的逃避者。这些隐修士目的在于逃避纳税义务,并脱离社会去过一种强制信仰的宗教生活<sup>[19]3-24</sup>。但是,安东尼的家庭背景和帕克米乌斯修道院的经济状况或许可以说明,单单用逃避赋税义务来解释修道制度的起源似乎略显牵强,主观臆测的成分居多。而且在367—368年的一份税收表记载了塔巴尼斯修道院的修士阿努比亚缴纳的赋税,证明在帕克米乌斯死后21年,该修道院应该向当地政府交纳赋税的事实。不管怎么说,帕克米乌斯修道院在4世纪的埃及的合法地位是很明显的。可见,帕克米乌斯修道院在社会和法律框架内,拥有自己的土地并且交纳赋税<sup>[20]267-285</sup>。

现代新教徒和无神论者也倾向于修道士是懦弱者,他们逃避世界及其责任。但早期遁世者反对称他们为逃避,相反认为是独自与撒旦斗争,因为长期以来沙漠被埃及人视为魔鬼之家,塞特的领地。现代心理学家也承认这是一种反对肉体欲望和精神诱惑的内在斗争。这些修道士在从事拯救自身灵魂活动的同时,还积极为其他人祈祷。现存不列颠博物馆的一些写给帕菲奴提乌斯(一位4世纪的隐修士)的纸草信件中,反映出他们的祈祷被视作反对黑暗势力的有效武器。其中亚历山大大大主教阿塔纳休斯写给他的信件中有这样的话,“你的祈祷因为神圣的爱而带来许多收获,因此希望你能为国家繁荣祈祷”<sup>[15]110</sup>。

除此之外,埃及的自然条件也是修道运动形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相比而言,古代埃及的自然环境也较易于隐修士野外生存。中埃及和上埃及的温度是如此的适宜,降雨是如此的稀少,以至于在旧坟墓、石坑或岩洞的庇护下进行野外生活,不会遭受太大的痛苦。大型食肉性动物在这里难觅踪迹,有一定的安全性。尼罗河两侧荒寂的沙漠中的干河或许还可以找到一些水源。早期修道者完全有可能离开居民区而到沙漠中荒僻的地方去,在那里从事一种苦行和祈祷的忏悔生活。

修道制度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究其最初的源头,是在罗马帝国晚期的政治经济背景

下,广泛吸收了东西方神秘和禁欲思想而兴起的一种基督教革新运动。当然,作为滥觞之地,埃及本土的自然条件、文化背景、政治特点、经济生活和社会结构对修道制度的兴起有很大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O'Neil. The origin of monasticism. Rowan Williams(ed.). The Making of Orthodoxy[M]. Cambridge, 1989.
- [2] 王亚平. 修道院的变迁[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 [3] Sundkler & Steed.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Afric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4] 费尔巴哈. 基督教的本质[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 [5] 吴舒屏. 试析东正教的遁世主义修道理念在拜占庭时期的发展[J]. 世界宗教研究,2002(1):58-66.
- [6] 章雪富,石敏敏. 早期基督教的演变及多元传统[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7] 吉本. 罗马帝国衰亡史(下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8] Kamil. Christianity in the land of the Pharaohs [M]. London and New York, 2002.
- [9] 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3 Vols)[M]. California, 1974.
- [10] Atiya. The Coptic encyclopedia[M]. New York, 1991.
- [11] 陈志强. 拜占庭帝国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12] Dodds. Pagan and Christianity in an Age of Anxiety[M]. Cambridge, 1965.
- [13] Griggs. Early Egyptian Christianity from its Origin to 451CE[M]. Leiden, 1990.
- [14] J. G. Milne. Egyptian Nationalism under Greek and Roman Rule[J]. JEA, 1928. 226-234.
- [15] H. I. Bell. Egypt from Alexander the Great to the Arab Conquest[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 [16] J. D. Fag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M]. Cambridge, 1978.
- [17]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Vol. 18) [M]. Chicago: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1993.
- [18] Marilyn Dunn. The Emergence of Monasticism [M]. Oxford, 2000.
- [19] W. H. C. Frend. The monks and the survival of the East Roman Empire in the fifth century[J]. Past and Present 54, 1972. 3-24
- [20] J. E. Goehring. Withdrawing from the Desert: Pachomiu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 Monasticism in Upper Egypt[J]. Th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3, 1996. 267-285.

责任编辑 张颖超

## On the Origin of Christian Monasticism

TIAN Ming

(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e monasticism of Christianity originally sprang from Egypt under the reign of Roman Empire in the third century, A. D. For the complexity of the investigation itself,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origin of monasticis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deology, social politics, and economy including the role of Egypt, the cradle of monasticism.

**Key words:** monasticism; Egypt; origin; Christianity